

· 港澳研究 ·

主持人語：

關注陶一桃教授之於中國改革開放史、中國經濟特區發展史、中外經濟特區比較研究的讀者會發現，其學術理論研究與社會變革實踐的深度融合，在學界留下了清晰的印記。僅在本刊發表的論文，從近年《經濟特區與中國制度變遷的路徑選擇——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歷史進程的理論思考》(2018)到《中國道路的又一偉大實踐——從經濟特區到粵港澳大灣區》(2019)，從《深港融合發展與區域經濟韌性》(2022)到本期的《經濟特區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制度演進績效》(2025)，即可窺見陶教授的經濟特區、港澳研究，乃至粵港澳大灣區學術研究之路。

陶一桃認為，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中國共產黨人百年探索的思想與智慧的積澱，同時又是中國改革開放 40 多年來所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實現現代化的發展模式。這一發展模式以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為實施路徑，以經濟特區為實踐載體與先行先試者。在完成由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中，一方面，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以制度資本的稟賦加速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另一方面，作為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實踐載體的經濟特區，又以其“制度增量釋放源”的特質，強化著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擴散效應”，從而對中國式現代化的整體進程產生著由內在邏輯機理而形成的制度績效。

經濟特區作為中國特色漸進式改革的實踐載體與中國式現代化的先行者，符合邏輯而又相輔相成地把改革的路徑與發展的模式統一起來。經濟特區作為漸進式改革的實踐載體，不僅在制度安排上弱化了無法避免的轉軌阻力，而且還制度化地構成了實現社會轉型的“內生動力機制”，從而保證了中國式現代化的順利實施；經濟特區作為漸進式改革的實踐載體，以其先行先試的成功實踐，不斷為中國社會的改革與深化改革提供著可借鑒、可複製的制度資本，從而保證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穩步推進；經濟特區作為漸進式改革的實踐載體，在發展是硬道理的理念下，很好地完成了社會轉型與經濟發展的契合，在改革之初就為中國式現代化探索出了一條“轉型發展”演進軌跡。

同時，沿著中國道路的實踐軌跡，從經濟特區、自貿區到粵港澳大灣區，其形成與發展在邏輯上是相互關聯並功能遞進的。粵港澳大灣區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中，以超級“制度增量釋放源”的獨特功能，推動著中國式現代化的時代進程。

相對陶教授比較宏大的特區經濟研究選題，江華博士則聚焦於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四共”新體制的建設——對國家的改革開放大局，對粵港澳大灣區、澳門而言，同樣具有獨特的意義。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不僅有利於在國家層面上助力我國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協同發展，在國際社會講好“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中國故事”；而且有利於在特區層面上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合作區承擔著打造“一國兩制”實踐新示範的重要使命。“四共”新體制，即合作區由粵澳雙方“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安排，是我國在推進區域合作中一項極具創意的制度安排，在堅守“一國”之本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兩制”之利，賦予合作區特定的戰略功能和示範價值。

2024 年 12 月，在澳門回歸祖國 25 周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正式啟動建設 3 周年之際，習主席再次視察澳門及橫琴，他叮囑“一定要牢記開發橫琴的初心就是為了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強調“要堅定落實規劃，保持戰略定力，堅持久久為功”，指明了橫琴合作區建設的方向與下一階段發展的戰略路徑。澳門—橫琴新成效值得期待！（劉澤生）